

◀ (上接11版)

有其深度。

徐先生对于“礼教吃人”说予以批评,指出:“即使在封建时代,礼也是维系‘人地’地位及人与人的合理关系,而不是吃人的。封建的宗法制度,主要靠亲亲与尊尊两种精神;礼即是把两种精神融合在一起,以定出一套适切的行为规范。这与由法家只有尊尊而没有亲亲的精神所定出的秦代礼仪,绝不相同,在实际上大大缓和了政治中的压制关系。汉儒多反对叔孙通取秦仪以定汉仪,而思另有所制作,其根本原因在此。”(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徐复观全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87页)

徐先生认为,“立于礼”,“约之以礼”,以礼来节制人的性格与行为,以礼为“为仁”的工夫,是孔子立教的最大特色之一。“孔子的后学,由古礼以发现礼意,即发现古礼中原有的精神及可能发展出的精神,由此对礼加以新评价,新解释,以期在时代中有实现个人、社会、政治上合理生活方式的实践意义,作了长期的努力;此观于大小戴《礼记》中先秦的遗篇而可见。《春秋三传》亦无不以礼为纲维、为血脉。这不是其他各经所能比拟的。”(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徐复观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57页。)汉承秦代刑法、官制之后,社会人伦秩序出现一些问题,叔孙通们的朝仪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西汉儒者,自贾谊以降,莫不继先秦儒者,重新诠释礼乐,并借助礼乐之教的推行,补充刑法、政令的单面化,发展民间社会,调整政治、社会与人生。在一定意义上,礼乐是补充、调整、改善单面的刑法或政令的。此有助于文明的建构与保护民间的道德资源。

儒学以仁义为道体,以礼乐为路径。礼是民族、国家、社会、家庭的秩序。以个人言,守礼则文明,无礼则禽兽。以群体言,隆礼则致治,悖礼则致乱。乐是礼的补充。礼治理身形,乐陶冶性情。法律出于强制,礼则出于人性之自然,靠人的良知与社会习尚即可推行。法治无礼乐辅助,则徒有具文。民主无礼乐维系,则徒增混乱。如人人不知尊重他人,亦不知尊重自己,又怎

能施行民主?礼的作用,在保障人与人自由的界限,人类要求得自由,不能离开礼与礼乐。礼与礼乐是从社会上层到老百姓的行为方式。西方法律背后是基督教精神在支撑在起作用,中国新时代法律背后一定要有本土文化精神,特别是长期积淀下来并对公序良俗有滋润的儒家礼乐文明来支撑来起作用。

“礼”具有秩序、节度、和谐、交往四大原理。三礼之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仍有其现代价值。礼让为国,安定社会,消弭争夺战乱,节制骄奢淫逸,是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的前提。以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行为,调和各种冲突,协调人际关系,使人事处理恰到好处,是礼乐制度的正面价值。这里有社会正义的意蕴,即反对贫富过于悬殊。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富了以后怎么办?孔子讲“富而后教”,“富而好礼”,讲教化、教养,反对辅张浪费、夸财斗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要有土豪的心态与做派。目前我国的大众文化渲染淫逸,对社会风气有极大的腐蚀作用,对青少年的成长十分不利,而文化批评的力量却格外薄弱。这是值得我们检讨的。“礼”恰好是调节和治理我们的欲望人情的。

就现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律的道德良知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即包含社会礼俗在内的成文与不成文的生活规范,这就是所谓“礼”。古今社会规范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但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群体、乡村、社区、邻里的关系,促成家庭与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规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务。在这一方面,礼学有深厚的资源。就国家间的交往而论,尽管周秦之际的诸侯国与现代的民族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但互利互惠、和平共处的交往之礼义,亦有可借鉴之处。

礼乐文明在社会与国家治理方面,在人的精神安立、安身立命方面的意义甚大甚广,不可轻视。我们今天建设新时代的礼与礼乐,应以此为目标。

(作者为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本文节选自作者在2018年11月“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

## 隆隆作响的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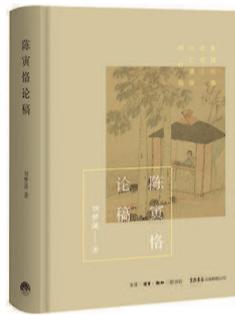
刘梦溪

马一浮也是影响我至深的学术大师,相比之下,他的影响表现为潜移默化,缓慢地润入心田,陈寅恪则是隆隆作响的震撼。所以如此,是由于陈寅恪的学说有一种志不可夺的力量。

我研究陈寅恪迄今已二十有五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出了三本书:一是《陈宝箴和湖南新政》,2012年故宫出版社出版;二是《陈寅恪的学说》,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三是本书,《陈寅恪论稿》,仍为三联出版。书中的篇章文字系陆续写成,也大都在学术刊物和报纸的学术版刊载过。只是整理成书是最近几年的事。因为同时也在研究其他课题,所花时间比研陈多得多。单是研究马一浮就持续十有余年。由研马而进入宋学,旁涉佛学,又返归六经,时间更无法计量。何况还有多年来一直关注的国学,以及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一些课题。

这种多头并进的研究方法,好处是不致忘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而为一隅一曲所局限。不好处是,战线长,论域多,出书慢。以至于一度常不自觉地诵念一副对联:“终年著述无一字,大患分明有此生。”当然也和六十初度时生了一场大病有关。熟悉我研究状态的一位友人,一次打来电话,问又叉到哪儿去了。我说马一浮。他大笑,并问何时回来。显然指的是回到陈寅恪研究。所幸无论我走到哪里,陈寅恪的思想和精神,都不离不弃地跟随着我的行程。古今东西的大师巨子,很少有像陈寅恪这样,因读其书而受到透彻的精神洗礼。马一浮也是影响我至深的学术大师,相比之下,马的影响表现为潜移默化,缓慢地润入心田,陈则是隆隆作响的震撼。所以如此,是由于陈寅恪的学说有一种志不可夺的力量。“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试想这是怎样的情致,何等的力量。百年以来的现代学者中,没有第二人能够与陈寅恪的这种精神情致相比肩。

《陈寅恪的学说》一书,主要是梳理和还原陈氏学说体系的内在结构,提出陈寅恪不



“陈寅恪的史学带有文化史学的特点,其选论论域之要旨,实在我国古代思想和制度。”

——《陈寅恪论稿》

仅是大史学家,而且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体系的构成,一是属于义理学维度的种族与文化的学说,二是属于考据学范畴的陈氏阐释学,三是属于词章学方面的佛典翻译和文体论。此三方面的内容构造和研究旨趣,我在《学说》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三个章次,作了重点分论与阐释。余者第一章为探讨陈氏学说形成的个人经历和家世背景,第二、三章是还原其博学兼通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第四章系阐明“中西体用”的文化态度在学说建构中所起的立基作用。最后的第八章,章题为“陈寅恪学说的精神维度”,意在总括其秉持一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何令陈氏学说闪现出照彻人文学领域的永恒之光。也许这就是此书出版后,一直受到读者青睐的缘由吧。

《陈宝箴和湖南新政》则是对义宁之学的一个专项研究,尽力在汇拢爬梳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再现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其子陈三立的襄助下,引领和推动1895至1898年湖南维新运动的历史过程,以重构当时从朝廷到湘省的复杂多变的人物关系和当事人的心理结

构。全书共九章,第一章叙论陈宝箴膺任湘抚前在季清社会所扮演之角色,是为前论部分。第二至第六章叙论湖南维新运动的举措和展开。第七章和第八章论述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机遇和挫折,以及因慈禧政变而遭遇失败。此七、八两章是为该书的高潮部分,时局的跌宕变换所导致的人物关系的重组和当时人的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此两章有具体而微的呈现。最后的第九章,特为考证陈宝箴死因而作,长四万余言,是《新政》篇幅最长的一章,有关陈宝箴系慈禧密旨赐死的任何蛛丝马迹的线索,都鲜有放过。后来吾友陈斐先生又补充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新材料,使得此一疑案不致再有他解。此一悲剧事件,对陈氏家族的打击极为沉重,不止陈三立首当其冲,大病几死,当时只有十岁的未来的史学家陈寅恪也受到心灵的巨创。

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陈寅恪论稿》,在性质上可作为《陈寅恪的学说》的姊妹篇。如果说《学说》是对陈氏学说体系内部构造的疏解,《论稿》则是对陈氏学说体系外部学术触